

曹明文集

短篇小说

1

作者从1932-1982年间所写短篇小说的选择。包括20世纪30年代对广东地区缙丝女工和劳动妇女的生活与斗争的描述；40年代对爱国知识分子、敌后抗日根据地英雄的八路军战士与人民群众的歌颂；新中国成立后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讴歌。

中国青年出版社

草明文集

草明
著

短篇小说

1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肖像

毛主席和延安文艺工作者在一九四



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会期间的合影



延安文艺座谈会照片说明：第一排左起第九人为草明

第六章 动荡的一九三八年

啊，久违了，故乡，我又回到你的怀抱了。

世事真难预料，一九三三年的秋天，我们为逃避反动派的鹰爪，乘坐一艘运载生猪的货船逃亡上海。奎之四年，同是秋天，由于日寇侵占上海，我们为了逃出虎口，乘坐一艘破旧的难民船回到广州。在上海这四年中，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我经历了牢狱的生活，还经历“左联”的解散。我目睹伟大的作家^{鲁迅}的逝世所引发万民^如哀痛^便反动派^{的队伍}惊惶

经历了提心吊胆躲避特务追踪。

草明文集

臧克家題

1992年臧克家先生为《草明文集》题写的书名

《草明文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贺敬之 于 敏 柯 岩
余 飘 郑伯农 陈建功

主 编

欧阳代娜 欧阳天娜 吴纳嘉

编委(按姓氏笔划)

王世尧 田海蓝 张巧莎 李健明 李国征
吴纳嘉 周以纯 欧阳天娜 欧阳代娜

《草明文集》总目录

序

陈建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者自序

草明

前言

欧阳代娜

第一卷

短篇小说

第二卷

中篇小说

中篇《绝地》《原动力》《小加的经历》

长篇《火车头》

第三卷

长篇小说《乘风破浪》

第四卷

长篇小说《神州儿女》

第五卷

散文 报告文学

第六卷

回忆录

第一部分 自传体回忆录《世纪风云中跋涉》

第二部分 献给导师和战友的歌

第三部分 草明生平

草明年谱

后记

序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陈建功

草明老师的女儿吴纳嘉找我，请我为《草明文集》写个序言，这让我十分惶恐。一般来说，有资格为老师的著述作序的学生，大多是老师的高足，无论人品与作品，都应老师所赏识。至少，此人也应参与了老师著述的整理工作，借写序的机会，或追思老师的为人，或阐发老师的成就。我自知谫陋，虽然读过老师的许多作品，在写作上有所请益，却未曾从学术上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为《草明文集》的出版做什么事，何德何能承担如此重托？

然而，最终，我还是决定为《草明文集》写下一点什么——老师去世以后，每每想起她，心中时时升起遗憾和悔恨，有如自己的母亲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在”。回报无门，写下一点文字，算是怀念，算是告慰，也算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点力量。

从草明老师为我指导第一篇小说算起，我向草明老师请教有近30年之久。1973年我和几个工人作者在编辑李炬同志的带领下，敲开史家胡同53号的一扇小门。走进老师的家，我几乎吃惊得收不拢嘴巴——是因为草明住宅的局促：两间阴暗潮湿的小房，更小的一间是书房，我们七八个人一个挨一个坐了下来，真是仅可容膝而已；再是因为老师的瘦小，当年她已经60岁，已见花白的头发，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当时我对老师的了解，也就是知道她是“左联”老战士，和鲁迅先生有过来往等等，至于作品，我记住了《原动力》里的孙怀德和《乘风破浪》里的宋紫峰。仅凭这些，草明老师已经在我心中罩上了大大的光环。因此，面前这个身居陋室、身形瘦小的老人实在令我有些意外。那个时候，“文革”的狂风暴雨初歇，也曾经受到冲击的草明，似乎是刚刚被“解放”出来，她掩不住兴奋，对李炬同志说，她正在和“一机床”联系，应该马上就要回到工人们中间啦……从那一次开始，我成为了草明老师家的常客。每个月从京西矿区回来休假，我都会到她家请教。我们的话题是广泛的。谈鲁迅、谈延安文艺座谈会，也谈《原动力》、《火车头》和《乘风破浪》。熟稔之后，我也曾把希望“挪动”的心思毫无遮掩地和盘托出。有一次，我向她诉说了当矿工的艰辛和苦闷，她听了沉默良久，似乎听出了我欲借文学以改变命运

的愿望,她坦言相告:作文学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赚钱,更不要迎合什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叹了口气,告诉我,年轻的时候她也差一点成为一个缫丝女工,尽管最终未能如愿,但她觉得自己的心始终是属于她们的,最初的作品就是她们的苦难和她们的呐喊。她说,你当个矿工不容易啊,当上了,别老想着逃跑。多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借文学传递他们的心声吧!……此后没过几个月,我因工伤而住院。出院没多久,草明老师从城东赶到西郊我的家中看我。我记得,她抚摸着因骨折而凸起的脊椎,对我的父母痛心地说:“现在我在想,那次我是不是说错了?伤成这样,让人心痛啊。”随即她又对我说:“不过你不是逃跑的,你是伤病员,不能不下火线啦。你骨子里还是和矿工们连在一起的,好好养伤,找机会好好写写他们吧!……”

此后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上了北大。从现当代文学史里我才知道,草明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作家,作为新中国工业题材创作的开创者,她塑造了系列的、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工人阶级形象,而这形象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她秉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精神,怀抱着“和工人打成一片,借文学传递他们的呼声”的渴望。她把这作为文学理想,也作为人生的信条。她带着对贫苦百姓的深情,投入左翼文学运动。她被反动当局羁押判刑,又经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营救而出狱。而后,她的理想非但没有挫伤,反而如春草萌生,越发生气勃勃。且看她出狱后写的中篇小说《绝地》,既充满了写实主义的真切,更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她借人物之口,毫无顾忌地赞美那支“爱护穷人的奇怪的军队”,一支“神话一般的军队”,她憧憬着“苏区”：“……那儿有一大片地方,通福建、江西,那儿有正直的人。呵,将来那儿能通到广州,能通到全中国,唉,那时候我们过的日子才是人过的日子哩……”抗战胜利后,草明老师遵循“讲话”精神,寻找生活的基地,她沿着缫丝女工时代的情感轨迹,来到解放区的工人们中间。她走进了宣化龙烟炼铁厂,走进了哈尔滨邮局,走进了镜泊湖发电厂,走进了皇姑屯铁路工厂,走进了大连十八机床厂,一直走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鞍钢炼钢厂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她的代表作从《原动力》、《火车头》到《乘风破浪》,成为了新中国早期工业生活的缩影,所塑造的工人形象,成为了翻身做主人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古稀之年,草明老师壮心不已,她的步履,还出现在长江三峡、华北油田、上海浦东开发区。更为难得的是,直到晚年,她还为读者奉献了长篇小说《神州儿女》,再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四人帮”斗争的壮阔画面。草明老师深入生活,不仅“身入”,更是把心交给了工人兄弟。在我认识的工人作家中,不少人都说过自己是草明老师的学生。后来我才发现,在鞍山,在一机床,几乎在她足

迹所到之处,她都组织过工人写作组或办过写作训练班,经她培养而成为“工人作家”者,大约有200人之多。她去世后我才知道,她深入生活期间,曾经把节俭出的不少稿费和工资,交了党费或送给生活困难的工人家庭以救急。联想她朴素的衣着,简单的饭菜,其信念之执着、情感之丰沛、人品之纯粹、人格之高洁,难道不是可见一斑了吗?

然而,草明老师的晚年,竟也遭遇到被误解的痛苦。

当下的中国文学界,经历了多年风雨的磨炼之后,识人的慧眼可以说基本造就了。作家们对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审美取向,有了更为宽厚的包容之心。文场上尽管仍然不乏“跳来跳去”的人,但已经很难有过去的影响力了。而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场,似乎有一个“左中右”的“铁律”在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坦率地说,在社会传闻的界定下,我和草明老师似乎并不同属一个“阵营”。因此,关于草明老师的一些传言,我也有所耳闻。当然,以我对草明老师的了解,我从来是不信的。就像“文革”结束不久,有人说我的另一位老师浩然是“四人帮”余孽,我也同样要站出来,据我所了解的,澄清事实一样。文场宗派,自古已然,而这与政治风云的大潮相结合,为害尤甚,不知冤死了多少有才华的作家文人。

在草明老师的晚年,坐在她家那矮小的竹椅上,听她诉说自己的心事,我更深切地感到这种宗派的误解给一个正直的、追求完美的作家所带来的铭心刻骨的悲凉。

时间应该是9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北京作家协会做专业写作,被《工人日报》聘为一个奖项的评委。来到会场时,发现草明老师也是评委。我赶忙趋前请安,她和以前一样,和蔼地一笑,并没有更多的话。吃午饭时我们邻座,她问我:“怎么就不到我家来了?”我很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一是因为孩子还小,家务事多,二是因为您从史家胡同搬走啦,找不到您啦。要不,今天我陪您回去,认认门,跟您好好聊聊?”饭后我陪她来到位于三里屯的家。她的家要比史家胡同时大了许多,也干爽明亮了,但家具还是那几件,墙上还是挂着“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和沙飞摄的“鲁迅和木刻家”。我们在客厅里一对小小的竹椅上落座,刚坐下,草明老师问我:“你很久没来看我,是不是听到了关于我的什么说法?”我很窘,说:“说法是听到一些,但我根本不信的。之所以没来看您,和那些说法毫不相干,也和有人把文学界分为这个派那个派不相干。不要说我的星点进步都得益于您的教诲,即便和您有了分歧,那种教诲之恩,也是没齿难忘的。”老师先是淡淡地一笑,随后却用纸巾擦起眼泪来。我知道,草明老师从来就是从容淡定的,到了掉泪的地步,心中的委屈该有多

大,已然可想而知。然而我一时无语,不知该怎样劝慰她才好。

默默地流了一会儿眼泪,草明老师竟很快就冷静下来,对我说:“是啊,比起20年前,你成熟啦!”

我庆幸她从痛苦中走出来,故作轻松地说:“哪里成熟!是老啦。不过到了不惑之年,似乎对什么事也该有点自己的判断了。”

她笑笑,说:“好在中国是越来越好啦,我是过来人,革命嘛,误伤总是可能发生的呀。”

接着,她告诉我,1945年,她到东北新区工作前,到毛主席那里辞行,毛主席还问她,在整风时受委屈了没有。她说,毛主席告诉她,有也不要紧,审查者和被审查者都应该从中取得经验教训。她还指着那幅“鲁迅和木刻家”的照片告诉我,照片的摄影者沙飞也一样,他的委屈更大啦。

我想起草明老师过去也曾有过被冤屈的遭遇,似乎她是险些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或许,那个时候,她就是这样坦然地面对坎坷的?我对她说,不过,个人的名誉和权益也是要维护的。

她说,交给组织吧,组织再解决不了,就交给历史吧!

我记得当时一愣,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快又从痛苦中走出来了。

她的淡定让我钦佩。

此后,每当我也遭遇类似的误解时,我就想起她那痛苦之后的从容,想起她留下的名言:交给组织,交给历史。

她不仅拥有开拓理想的执着,而且也拥有在世纪风云中跋涉的自信。

她瘦弱,却是个强者。

令我欣慰的是,草明老师远行之时,组织上已经对她的一生给予了全面的、高度的评价,甚至对某些不负责任的传闻也给予了澄清。然而,我最终相信的,还是历史。

历史最终会揭开某些谜团的真相,也会揭开某些事件的本质。历史毕竟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崇高与渺小,真相与遮蔽,最终会在灿烂的阳光之下一清二白。

其实,这阳光已经像风一样在历史的谜团间穿来绕去了,那它们化解和澄清的时候还远吗?

既然如此,我以为大可不必纠结于此,相信未来吧。

有了如此的信念,草明老师是可以安息的。

是为序。

2011年5月27日

作者自序

1992 年 1 月

在全国总工会的鼓舞与协助和顺德乡亲们支持与促进下,《草明文集》终于面世了。这是我从六十年的创作中挑出六卷来奉献给亲爱的读者的一份小小礼物。

有不少同志问过我:“你六十年来为什么专门写工人呢?”

我想,我只能这样回答:“那是因为和我所处的时代、生长环境及党对我的长期的谆谆教导与指引分不开的。”

我少年时期,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人民被三座大山压得濒临绝境的时候;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相继掀起了反对统治阶级的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等等的工人运动,在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我呼吸着时代的气息、吸收着精神营养,从不知不觉中崇拜工人阶级。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我是顺德桂洲乡人。桂洲当年是个手工业的乡镇,中小缫丝厂林立,唱主角的是女人,乡中四十岁以内的女人几乎都在丝厂干活。我没有钱去上学,又拿不出拜师钱去学缫丝,那只好成天在厂内外转悠、玩耍,听她们随编随唱的怒骂、怨恨、讥诮的动人的木鱼歌调。我喜欢她们,我爱她们豪迈、勇敢与坦荡的风格。我从小就种下同情工人阶级、爱工人阶级的根子。

然而命运将给我安排什么呢?母亲希望我念几年书,在乡下做个接生员,能独立生活就是最高目标。她拼命干活,终于送我到桂仪小学念书。只念了一年,母亲因操劳过度而病逝。哥哥和我更陷入饥寒交困的境地。

我十四岁那年,父亲有个偶然的机会有去广州念书。父兄希望我读完师范,能当个小学教师便心满意足了。

就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冬天,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发生了。我听人家说共产党是劫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的。我们巷口一位“红带友”被打死。我心想,这样好的人为什么打死他?!这许多问题,和社会上许多黑暗怪现象不断地掀起我思想的波澜。

我十七岁时,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我随学校下乡宣传抗日救国、收

复失地。我们学生队正是群情激昂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硬把我们赶回学校,不许抗日,引起了群众的轩然波动。我那时忍无可忍,恨不得把反动派捣个稀烂。这是当时进步学生的普遍情绪。(这阶段我已写了一些小说。)但现实告诉我们,革命是严肃、艰苦而又壮丽的事业,不能浮躁,要有思想理论的准备。于是我参加了秘密的读书会,初步学习一些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还参加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东分盟,参加一个专给工人和穷人看的进步小报的编写工作。我开始创作就一脚踩到现实生活上,顺德缫丝女工的形象、失业后的灾难与她们的反抗斗争在我脑子里源源出现,成为我写作的素材。我热情地写她们,有时甚至流着泪写我那些不幸的姊妹们。我写了不少短篇,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缫丝女失身记》(都已遗失)。

这时期,我早已抛弃了母亲为我安排的前景,实际上也抛弃了父兄给我安排的终生安安稳稳地当孩子王的生活目标。我坚决走革命的路。当广州当局通缉我时,我便弃学逃亡上海,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去了。那是1933年的事。在上海,我还是写工人和劳动人民。除了短篇小说之外,我的中篇小说《绝地》,就是通过写一个工人家属,侧面反映橡胶厂的工人罢工斗争的。

第三个因素,应是从聆听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起。从此,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直鼓舞我前进。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的思想提高一大步。文艺不是别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作家要去掉非无产阶级思想,要长期地、全身心地到火热的生活斗争中去体验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学习他们的奉献精神 and 远大的理想……

听《讲话》以前,我写工人,爱他们、同情他们、替他们说话都是对的,但很不够,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上,不是有意识地深入生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他们的生活和阶级关系。我也没有与工人同艰苦、共命运那种密切的血肉关系。一句话:不深、不透。《讲话》督促我、鼓励我今后需要长期地深入到他们的生活、深入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中去。我采取到厂里参加实际工作的办法,并决心为这而奋斗终生。

在延安时,除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我还去绥德、米脂访问农民,并收集陕北那些醉人的民歌。我在党校休养所养病时,一面帮助一些由于旧社会生活贫困念书少的红军同志提高文化,一面请他们给我讲长征的故事和敌后抗击日寇的英雄业绩;这正好补充我欠缺的生活方面。

日本投降后,我要了却我在中学时候宣传抗日受阻的未了心愿。现在东北解放,我该为东北同胞做点事。那时东北最需要的是搞土改,因为东北不仅

在不久将成为进关解放全中国时的大后方之一,而且也是发动兵源的大好机缘。所以东北局号召凡是老区来的干部,一律下乡搞土改,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回来归还给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的觉悟。我当时报名去农村搞土改,但是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同志要我去工厂工作。我不愿错过亲近农民的机会,执意要去。林枫同志说服我道:现在的形势很快将由城市领导农村了,所以我们的作家必须熟悉城市、熟悉工厂、熟悉工人阶级。现在到东北农村工作的作家有周立波、马加等许多同志,在部队工作的有刘白羽、西虹、白翎等作家,就是工厂没有作家去,你就去吧;听李立三同志说镜泊湖水力发电厂的工人觉悟高,你到那边去吧。

我一听林枫同志的话,理解到我党的领导重心将要作战略性的转移,因而把文艺干部及早安排以便将来能全面反映新中国的各个方面和能反映出各条战线的劳动人民的英雄业绩。我心服了。

林枫同志的话使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怕辜负党的嘱托。但是我心里也有高兴的一面。我是在乡镇中手工业区生长的,写过很多关于工人生活与斗争的作品,那就勇敢地去做吧。我立刻参加市民对恶霸的斗争,参加接收哈市邮局并发动群众。后来我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去工作较长期。我自动教工人文化课,宣传共产党、宣传毛主席和长征的故事;还启发家属种菜、养鸡、养猪,等等。后来写了《原动力》。这部书是反映工人阶级受日本奴役十四年、解放后主动地积极地修复机器生产以迎接共产党的崭新面貌。这种情况在解放初期的工人阶级中是很典型的。当时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劳动大会的代表看过这本书后说:将来我们地区解放时,我们如何工作就有了榜样了。

自此以后,沈阳一解放,我自觉地到皇姑屯铁路工厂工作。从发放救济粮、献纳器材,组织写墙报和成立音乐队、戏剧组,并大力支持工人自动地利用业余时间 and 旧器材修复一部新机车,准备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壮举,直到在工人中建立团组织、建立党组织以后,我才离开该厂。我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车头》。恩格斯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我很喜欢这句话。对中国的革命历史来讲,这句话也是应验的。

当然,为了丰富生活,我也短期去访问过五二兵工厂、造船厂、机械厂,等等。在1951—1953年间奉命做了些东北文艺界的行政工作。1954年我到鞍钢落户,任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兼管宣传教育工作。在鞍钢十年,除工作外,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同时创作了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为背景的钢铁战线上那热火朝天的工人为国家发明创造、增加生产的长篇小说

《乘风破浪》。

我在长期深入工人生活的过程中，因做实际工作，不论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同工人休戚与共，因而不仅写作素材源源而来，我并向工人同志学到很多东西。镜泊湖的孙师傅、梅花水库的郑师傅，还有马恒昌师傅，鞍钢的老孟泰、王崇伦、李绍奎等师傅，皇姑屯铁路工厂的宋广福师傅等人，把荣誉推给别人，埋头奉献、团结奋斗、潜心发明创造、善于带领后进变为先进的崇高精神，不断地启发我、教育了我，使我的思想不断提高，不断净化。直到此时，我更深刻地感到《讲话》的无穷的生命力。

我在鞍钢，为了扩大文艺创作队伍，用九年工夫先后辅导工人的文学苗苗。二百多学员中有二三十名已成为全国作协会员或省市级的作协会员。

1964年以后，我被调到北京，在北京第一机床厂任党委副书记，还兼文学创作学习班的辅导工作。不幸的是“四人帮”作乱，搞乱了全国的和生活和工作秩序。我跟许多同志一样挨斗、住“牛棚”、下放劳动。粉碎“四人帮”后，我仍回机床厂工作，并创作了以某个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为主体，和“四人帮”作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直至胜利的长篇小说《神州儿女》。这本书出版时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这一段时期，除了《神州儿女》外，我还写了不少散文、杂文。我还找机会到改革开放的沸腾的生活中去探访、去呼吸新的气息，写了一些文章讴歌新的生活，颂扬新时代的风流人物。

人是不可抗拒地将日渐衰老，但我认为精神却要更加奋发，吸收时代先进的成果。生活不息，笔耕不已。这是我所坚守的信念！

编完这套书，思绪纷繁。我最激动并时时萦绕于脑际的，是在编选文集的过程中，许多具有真知卓识的同志对我的鼓励、帮助和督促，使我克服困难和病痛，勇敢地工作，这套文集才能问世。他们认为书的出版，固然是作者的成果，但同时是属于社会的。在宏广的革命文学事业中，作家们应该拿出更多的美好的作品来。

这套书的内容包括六十年的历程，青年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在旧社会，工人是如何在贫困、被剥削、被压迫下生活的，在新社会，当了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与全国人民是如何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中华民族先烈一百多年浴血奋斗才争取得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巩固、完善和发展而忘我奋斗的动人景象。

同志们的见解使我刻骨铭心！在这里，我谨向一切教育过我、帮助过我的同志、朋友表达我衷心的感谢！同时，希望看过拙作的读者们不吝指教。